



大家

# 祖父眼中的风水

□ 下毓方

跋履

# 嘉禾棹歌

□ 张子影

夏日傍晚，祖父从外面回来，搬一张竹椅，坐在院里的花坛旁，架老花眼镜，边饮茶，边读《封神演义》——这是远在往日近在眼前的永久一幕，只觉得小院的花很香，空气很香，祖父的衣衫也很香。

祖父看的《封神演义》，也是我童年的读物，旧版线装，竖排，书前有人物绣像。内中一幅哪吒，面如敷粉，唇似涂朱，手持火尖枪，臂套乾坤圈，身披混天绫，脚踏风火轮。又有一幅雷震子，青面獠牙，肋生双翅，手握黄金棍，作势如凌空下劈。两人都是我爱画的，描了一张，又一张。祖父一日见到，脱口称赞：“有笔法，有骨力，明天给你买张红纸，画了过年作门神。”

门神，家里去年贴的是尉迟恭、秦琼，那两位的武艺，岂能和哪吒、雷震子相比，哼。

机会难得，我乘机向祖父请教：“《封神演义》第十一回写阴阳官负责报时刻，阴阳官不是应该管风水的吗？”

“元朝才设阴阳官，掌管天文、历法、气象、占卜。商朝没有这个职位，是小说家的胡编。”祖父解释，“商朝也没有风水这一说，风水学兴于晋朝，祖师爷是郭璞。”

“那么，三国时期也没有风水学了，”思维跳跃，“我以诸葛亮相上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也是风水先生哩。”

“天地本身就是大风水场，日月山川，花草树木，飞禽走兽，无处不在。”这是祖父的本行，“比如，你可以把刘备看作水，把诸葛亮看作风。”

“倒过来不行吗？”这是很奇怪的。

“不行。”祖父胸有成竹，“刘备是主，诸葛亮是辅。风水之法，得水为上，藏风次之。”“《西游记》呢？”话出口又懊悔，这种杂书，估计老人家不看的。

祖父居然也了如指掌，他说：“唐僧是唐朝的和尚，唐在晋之后，已然有了风水学。唐

僧师徒四人的关系，这里面就大有风水文章。”

摇头，这不是我小脑瓜所能参透的。四弟把祖父定为晚清遗老，就年龄来说，委实是这样。据祖父修的家谱，曾祖父以上，家境殷实，也出过读书仕进人物。曾祖父本人，当过乡董，类似如今的乡长。祖父生于1887年，时为清光绪十三年，幼入私塾，饱读四书五经。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，1912年清帝逊位，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，“生于末世运偏消”，算得上是遗少了。步入晚年，自然就是遗老。然而，祖父既没有在晚清获得任何功名，更在民国初期，遭遇兵灾匪难的家族巨变，大户沦为赤贫，曾祖父为此推心泣血，抱恨离世，作为长子，他要站出来支撑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族——想要当遗少，也是不可能的了。祖父必须自立，为生计寻找一条出路。

清人黄景仁诗曰：“十有九人堪白眼，百无一用是书生。”祖父这个书生，于“百无一用”之际生出了一个匪夷所思而可思的想法：当风水先生。

家乡是不能待的了，人人知道他的底，于是东去一百里外的海滨——现在的合德。祖父说过，当时是一望无际的滩涂，这地方稍微高爽一点，不叫合德，叫“干饭港”，也就是渔民、盐民休息时吃干粮的港湾。祖父初次前来踩点，仅见五户人家。然而，他最终选择在这儿落脚，原因何在？

在于晚清状元、近代实业家张謇的一个决策。1918年，张謇在此地创建垦殖公司，招募大批启东、海门人入境垦荒植棉。查《合德镇志》，1863年，始有移民一户二人。1917年，为三户十九人，1919年，暴增至一千二百人。由是估计，祖父携祖母落户合德，属于闻风而动，见机而行，时间约在1919年左右。

唐诗有云：“莫道书生无感激，寸心还是

报恩人。”若干年后，我撰文替祖父感谢张謇，题目就叫《张謇是一方风水》。

俗称“一命二运三风水”，命是天生，运是机缘，风水在于人择人养。在合德，张謇是大风水，祖父是小风水。

祖父育有三男三女，均留在老家。长子，也就是我的父亲，时年十三四，仍在读私塾。至十六岁，身高一米八，膀阔腰圆，弃学，成家，挑重担了。未久，因外公外婆举家移居上海，也弄了一条船，去沪上闯荡。长兄即在“十里洋场”出世，这一南下，就是十年，其间酸甜苦辣，记下来，就是一部颠沛流离史。父母从来不讲，我仅听说父亲当过装卸工，拉过黄包车，对外滩和苏州河一带，十分熟悉。1932年，日本在上海制造“一·二八”事变，局势动荡，日子难混，也就撂耒北归，投奔祖父，摆弄风水罗盘。

二叔父，器宇轩昂，风流倜傥，但吾父老实憨厚，三叔父木讷少言，形象大打折扣。彼时乡俗，男女在孩童期就由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订下娃娃亲。我父母的结合就是这个模式。轮到二叔父，他生性叛逆，撇开祖父先为他订下的亲事，私下与邻庄张姓女子谈起自由恋爱。祖父严加阻止。毕竟是民国了，社会进步，人性开始苏醒，二叔父铤而走险，与心上人远走高飞，去了盐城南边的兴化。祖父盛怒之下，与二叔父断绝关系。从这件事看，老人家又的确没有脱离遗老的窠臼。

我是在祖父母身边长大的。祖母回忆往事，说得最多的，就是如何给我喂饭。而我印象鲜明的，则是祖父如何给我喂字。一张一张纸片，一个一个汉字，上午喂，下午喂，晚上还要反刍。

祖母笑我是“跟屁精”。祖父出门，不管是上街、会客、洗澡、看戏，以及给人办事，我都要跟着。风水的玩意我完全不懂，唯记得祖父为人看阳宅拉线，事毕，一再交代，家前

屋后的几棵树，要修剪整齐，隔壁的小河沟，要疏理清爽，最好在河边栽上一行花。

祖父爱荷花弄草。我记事起，在合德住过两处房子。老房北依小洋河，西傍一条岔河的闸口，门前左侧是一个花园，围以竹篱。园内搁二十来盆盆景。有树，如松柏、黄杨、银杏。有花，如牡丹、芍药、月季。新房在旧址南边六十米，西邻小河，有院，盆景是如数搬过去的，砌有花坛。无论老房新房，都处于镇子西头的末梢。曾问祖父：“您到合德的时候，只有几户人家，房子应该建在中心，怎么弄到现在成了街尾？”

祖父答：“这是标志，人家好找。”

这是住在老房子时的事。

搬到新房，是一九五三年的事，我读小学二年级。本文开头的一幕，大概发生在三年级。祖父爱花，同好有一位薛先生，来了就笑语晏晏，细论养花的乐趣。祖父爱京剧，东邻彭大爷是票友，两人一唱就是半天。人说“三个女人一台戏”，我见过的是两个老男人也是一台戏。祖父懂命理之学，后来有人找他算命，他能拒则拒，讲命既已天定，算之无益。

祖父家过日，院内一草一木，室内一案一桌，案上一砚一笔，桌上一碗一筷，都讲究整整齐齐，清清爽爽。就像他笔下的小楷，一笔一划，都规矩规矩，一丝不苟——人的言行举止也都对应着天地的大风水。

小学五六年级，我常常要好的同学来家玩。祖父一日兴起，跟我传授观人之术。如某人容貌清明，天高日晶，贵不可言，有将军之相；某人有道义之心，堪作八拜之交，但五官突兀，显示路坎坷；某人聪慧过人，百伶百俐，可惜参错骨立，身体单薄，务必要加强调养、锻炼。老人家看人用的不是相书上的术语，倒有点像地理上的词汇，我左耳进，右耳出，全不当一回事。孰知，几十年后，竟一一应验。

谈数

# 书评人在消失

□ 绿茶

近日，美联社宣布将停止刊发书评栏目，此举与《纽约时报》今年七月对其文化编辑部的重组形成了某种呼应。评论认为，该人事调动意味着《纽约时报》的文化报道也可能转向视频形式或社交媒体平台。

面对媒介形式快速更新迭代，传统的书评该何去何从？

针对这一现象，界面文化作了一篇《书评的丧钟为谁而鸣》的报道，该文采访了书评人、评论家、出版社编辑、社交媒体编辑等相关人士。受访者普遍认为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书评空间在逐渐消失，人们已经习惯短阅读，被信息海洋淹没的“手机人”，已经没有耐心阅读一篇严肃的书评。

因此，“书评人在消失”，那些社交平台的读书博主们成了出版社推书的新目标，“书评，还有什么用？”或不如一条笔记或者视频能带货。

《华盛顿邮报》书评人罗恩·查尔斯针对这种现象发表了评论，他认为，在这个碎片化的媒介环境中，书评依然承载着不可替代

的独特价值。尽管书评的影响力相对较小，且难以吸引足够的流量，但它在维护学术深度和文化价值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。缺乏深刻书评的文学界将陷入“无人打理的花园”。

如果新闻事业仍然部分是公共服务的，那么书评无疑是它最具表现力的贡献之一，我们应该捍卫它，直到最后一页。

尽管我已经不在书评媒体很多年了，也只是偶尔因媒体约稿写少量书评，但作为曾经的书评编辑，对书评的衰落始终关注和忧心。不久前也接受了一次采访，谈及书评及书评人相关议题，刚好借此机会表达一下我的看法。

媒介的变化，平台的更新，再自然不过，而真正的书评只存在于纸媒与纸刊，尽管现在纸质的书评媒体越来越少，但我发表书评的阵地依然是纸媒。从民国副刊以来，从来没有一种媒介可以替代纸媒对于书评的意义，就像董宇辉可以让某本书卖几百万册，也替代不了这本书的作者想在《新京报书评周刊》或《中华读书报》发表一篇高质量的书评。

只要纸质的报纸还存在，“严肃书评”就会一直存在，只不过版面越来越少，书评数量也越来越少，但正因为少，反而弥足珍贵，更应该认真对待。满屏的“AI体书评”和“小作文体书评”只是暂时的，完全无法替代书评对于阅读者的意义。

书评并没有固定的标准，甚至不成其为一种文体，随笔、书话、读书笔记、文艺评论等，都可以称为书评。好的书评应该是可以独立为文章，而不能脱离开书，否则就失去其意义。这就像《左传》之于《春秋》，《左传》虽然是对《春秋》的解释，也可以独立存在，大多数读《左传》的人不一定要读《春秋》，这就是《左传》的高明和经典之处。

我每次精选自己的文章结果时，对书评的选择特别小心，如果一篇文章只是应景式的对某本书的书评，它就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，通常不选入集。而那些能入选集子的“书评”，一定是一篇独立的文章，什么时候读都不过时，甚至能读出新意，这样的书

评才是好的书评，才值得选入。

近些年，我侧重“行走”与“阅读”，读完一本书，总希望带着书到“书的现场”亲自看看，历史与现实，如何在这里重现，书中读到的和肉眼看到的，有着哪些联系与差异，找到阅读的另一种乐趣。

有论者谈及“书评人在消失”，其实所谓“书评人”只是一个说法，并没有这种“职业”，我也被称为“书评人”，但实际上无法凭借这个身份获得薪酬回报。“书评人”这个说法其实挺让人尴尬，尽管每年读书不少，但真正“评”的书却很有限，基本集中在年底参加各种好书榜，而为一本书撰写书评，更是少之又少，自然也跟如今书评纸媒越来越少，约稿越来越少有关。

书评作为一种有着悠久传统的文字，我们应该维护这种传统的延续，尽管发表书评的地方越来越少，但丝毫不影响书评对于阅读世界的意义，哪怕只是发表在公众号，或者收录到自己书中，书评，都应该是值得我们珍视的文本。

后窗

# 在有意无意之间

□ 李京禄

单纯从个人的、生活的、具体的情感出发，鲁迅其实也是充满着矛盾，具有性格弱点，不么么追求精致、生活随性而自然的凡人，一切都是在有意无意之间，有着魏晋士人的风度，有着松弛闲适的情感，周身遍布的烟火气，反而让鲁迅更具人间气质。

鲁迅烟瘾极大，传世的黑白版画不约而同地要突出他烟不离手的惯常动作。绍兴故里的鲁迅浮屠，左手举着香烟，烟篆在袅娜上升。每天要抽30至40支烟，总之只要是醒着，无论写作思考、会客聊天，鲁迅总是安然地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，烟灰随着手势有意无意间飘落。鲁迅备有两种纸烟，刻意做出某种区分，荷包不太充实是主要原因，贵的前门烟装在白听子里用于待客，便宜的装在绿听子里自己抽。在北平教育部社会司做金事时，喜欢吸哈德门牌的十支装香烟，每五十支四角到五角钱。抽烟的方式在无意之间打出招牌动作——用大拇指和其余四个手指拿着，类似于针灸，而不是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，让人过目不忘。

在萧红眼里，鲁迅先生依着沿苏州河的铁栏杆坐在桥边的石围上，拿出香烟，装上烟嘴，悠然地吸着，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别无二致。在家人眼里，鲁迅从下午三点钟

起，直到夜里十二点，坐在藤躺椅上陪人聊天，不断地吸着烟。《野草》的最后一篇《一觉》中写道“风雨如晦的深夜里，点起一支烟，思虑不已。”

鲁迅不是不知道抽烟严重损害健康，在放与收敛之间，他有意无意间选择妥协，这与一贯战斗的姿态多少有些违和。1925年9月30日，在给许广文的信中提道：“医生禁止吸烟，禁止喝酒。所以现已不喝酒而少吸烟，多睡觉，病也好了起来。”1926年12月3日，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：“今天我我发现我的手指有点抖，这是吸烟太多了之故，近来我吸到每天三十支了，从此必须减少。”鲁迅承认在戒烟问题上内心的软弱，“但愿明年有人管束，得渐渐矫正，并且也甘心被管，不至于再闹脾气的了。”与香烟相爱相杀，缠斗一生，直到1936年10月逝世的前一天，内山完造见他“坐在台子旁边的椅子上，右手拿着香烟……”

鲁迅对美食也不讲究，身为南方人却喜欢北方饭，对油炸的和硬的东西情有钟。三餐简单到不能再简单，素炒豌豆苗，笋炒咸菜是标配，客人来了黄花鱼要油煎。幼年家穷吃辣御寒损坏了胃，韭菜药合子和荷叶饼却不能多吃，饭后“脾胃美”药丸不可或缺。吃过东

洋墨水却不喝牛奶，偶尔吃点花雕酒，咖啡可汽水之类绝对不碰。用餐仪式也是介于有意无意之间，鸡汤端到目前，调羹舀一二下就敷衍了事，味道如何不太在乎。在生活的基调上，既简又淡，仿佛倪云林的山水，满纸不经意的烟烟，背后却是苦心的经营布置。

至于着装，照样以简单实用为主，于有意无意之间，随着生活环境和时代变迁而流转。在日本留学时，他穿学生制服或者和服；回国后在北京工作，常穿长袍和马褂；到了上海后基本以穿长衫为主，“混然众人矣”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打扮。若论特别，就是鲁迅的长衫总是显得破旧，甚至有补丁。许广平在做鲁迅学生时，速写过满身补丁、头发直竖的鲁迅肖像。对于破与旧，显然不是出于个人爱好，实在是生活窘迫迫下的烙印。夏着白布衫，冬穿灰棉袍，脚蹬黑帆布胶底鞋，鲁迅在会见外国友人萧伯纳、泰戈尔时，也是如此标记。

鲁迅的头发看起来硬茬茬，很符合他作为思想家和批判者的人设。这似乎是无意为之，因为他本人对理发并不在意，经常一忙起来就忘记，有朋友调侃：“你的‘地球’怎么还不削一削？多难看！”鲁迅回答很随性：“噢！我掏腰包，你们好！”有意无意地忽

略，曾让理发师技术发挥很不稳健。初见他衣着简朴，就随意应付，鲁迅就极随意地掏出一大把钱。再去理发，理发师使出浑身解数认真对付，鲁迅却掏出钱来一个一个地数给他，一个子儿也没多给。理发师不解，鲁迅答曰：“您马马虎虎地理，我就马马虎虎地给；您认认真真地理，我就认认真真地给。”投我以桃李报之以琼瑶，坊间笑谈自然未必为真，却尽显鲁迅在风骨之外的饶有风趣。理发时有含糊，对发型却很较真。在日本留学期间，鲁迅剪掉了头上的辮子，既是个人形象的变化，更是民族意识的宣示。随之而来的是胡子问题，最初留的是日式“仁丹胡”，中间弯两头翘，被视为“崇洋媚外”。鲁迅干脆“挥刀成一快”，毅然把胡子修剪成隶书的“一字胡”。这个造型伴随着他的后半生，和发型、抽烟一起构成了个人标识的固有构件，居然也成为有意栽花、无意植柳的桥段。

在历史的尘烟中回眸，鲁迅一生行止，有意无意之间都有一种规范，处世有节，张弛有度，张扬也内敛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删尽浮华留真淳，假如刻意多一点情感的参与，鲁迅也是血肉丰满的人间至爱。用鲁迅自己的话说：“删夷枝叶的人，决定得不到花果”，心中深意，难以辩说。

嘉兴位于江南，水脉如织，古称嘉禾。三国吴黄龙三年，嘉兴县野稻自生，吴主孙权视为祥瑞，赐名“嘉禾”，想来这应当就是禾城雅称之始。嘉兴东接淞沪，西连太湖，北通运河，南濒钱塘，自古便是“吴根越角”之要冲，水网交错间，舟楫往来频繁，孕育出了独步江南的“棹歌”文化。

棹歌者，舟子摇橹而歌也，乃吴地民歌之精粹。从宋代张尧同的《嘉禾白咏》，到明代许洵如的《秀州百咏》，再到朱彝尊的《鸳鸯湖棹歌》，其间百首棹歌以湖为轴，串起江南的风物人情，其韵致因水而生，因舟而咏，因情而发，尽显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。

初夏，又一次嘉兴之旅，白日遍访坊巷，“僧楼山塔互峥嵘”，月河景色让人沉醉。城的光影，一城的景色，常常分不清是今人入了古画，还是古画活成了风景。

这或许就是嘉兴的魔力，每一次重逢如初见般新鲜，又似故人般熟稔。

耳边忽然有棹歌起了：“晴云轻漾，熏风无浪，开樽避暑争相向。映湖光，逗新妆。”不知是谁在唱，像柳叶拂过水面，又恍若南湖自己漫出来的声音。歌声荡开时，岁月也跟着晃，范仲淹说的“浮光跃金，静影沉璧”一句，就在眼前活了——水面是铺开的宣纸，阳光是碎金，云影是墨团，一荡一漾，便是水墨长卷在眼前徐徐展开。

南湖岸边的烟雨楼仿佛渲染着千年水墨，楼檐铜铃轻响，似在叩问沧桑。乾隆六下江南曾在此驻跸，朱耷黛瓦间至今流转着帝王题诗的墨香；长虹桥横跨在京杭大运河上，暮色中依然勾勒出“长虹卧波”的绝美剪影。遥想当年，括括过此桥曾记“运河舟楫如织”，如今桥边的古槐发了新枝，绿得发亮。这桥是嘉禾的脊梁，驮过宋元的雨，明清的雪，如今还承着车水马龙，把过去和现在，缝成了一条不断的线；茅盾故居的天井里，紫藤花岁岁开落，仿佛在续写《子夜》里的繁华旧梦……“云明江屿出，日照海流长”，天空晴朗，江鸣清晰可见，阳光照耀下，运河水悠悠流淌，带着岁月的记忆，奔腾不息。

嘉禾棹歌最宏阔的吟唱，当在1921年盛夏。那是个蝉鸣聒噪的午后，湖面水汽氤氲，将烟雨楼晕染成淡墨皴染的画轴。这栋始建于五代、得名于杜牧诗韵的楼宇，即将见证开天辟地的瞬间。

舱内汇聚着十三位生气勃勃的英杰，他们是十三位来自天南地北的先驱者，压抑的声音下，胸膛中涌动着滚烫的理想。

船头划破南湖水，桨声起伏如歌吟，似在为这场秘密会议伴奏。会议间隙，所有人不约而同望向南湖的天空，晴天丽日，朗朗清风，他们激动闪烁的眼眸，一定看到了他们心中正在构建的理想世界。

黄昏，代表们在舱内庄严选举。他们中，那位穿长衫、身材魁伟高大、相貌堂堂的湖南青年格外引人注目。多年后，董必武重访南湖，挥笔写下“革命声传画舫中，诞生共产党工农”。

岸边柳树垂条蘸水，拂去岁月的尘埃，红船静卧，木质的船体里，沉淀着百年风雨兼程的密码。清风徐来，红船随波晃动，宛如一丛跳动的火焰。这抹红，后来漫过雪山草地，飘过长江天堑，最终在天安门广场的旗杆上，化作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。南湖的棹歌，也从此有了新的韵律。

如今再听嘉禾棹歌，调子里多了几分时代的节拍。

在长三院的实验室里，我见到了林晓宇博士。这位从上海来的材料科学家，十年深耕后，把家安在了嘉兴。“这里没有上海的喧嚣，却有让科研扎根的土壤。”现在的他，已是“半个嘉兴人”，能听懂吴侬软语，会包肥瘦相间的肉粽，“科研就像煮粽子，得有耐心等候，嘉兴就是那个火候正好的地方。”他的阳台对着运河支流，周末和爱人去月河喝茶，看“北堂红草盛丰茸，南湖碧水照芙蓉”，科研的严谨和生活的诗意，在他身上融得恰到好处。

杨向东教授的办公室里，总放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运动鞋。这位从清华来的柔性电子领域专家，每次去企业对接需求，都会换上休闲衬衫和旧球鞋，“这样像个‘车间师傅’，企业家才愿意跟你掏心窝子。”他说在这里调研时，常能在运河边遇到晨练的老人，在烟雨楼旁看见写生的学生，这些烟火气，让原本清淡的科研工作，多了几分温情。

秀洲区的乡村里，刘锐的白大褂格外显眼。这位曾在国外研究生态环境的学者，如今把实验室搬回了嘉兴的田间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难，她就带着团队研发出低价耐用的智慧监测设备，手机上就能看水质数据，哪里出问题，警报立刻响起。她的办公室窗台上，摆着一排水样瓶，从浑浊到清澈，记录着治理的历程。有次去农户家，老大娘拉着她的手说：“自从有了你们的机器，河里又能淘米洗菜了。”老人的笑容，让她想起刚回国时的决心——要让科技守护住江南的水，守住嘉禾的魂。

窗外的小河泛着银光，农舍的炊烟袅袅升起，科技的温度，就这样融进了乡村的日常里。

是日，夜归寓所时，细雨沾衣。我推窗望去，但见月光透过云层，把雨丝染成银线，蛙鸣从田埂间传来，时而齐整如鼓，时而错落如诗。案头摆着刚买的南湖茶，翠衣剥开，暗香漫过舌尖，是江南独有的清甘。雨歇后，月光漫过窗台，在笔记本上投下竹影，忽然想起古人说的“山水含清晖，清晖能娱人”——嘉禾的山水，从来都这样，既养得出千年的棹歌，也托得起今天的创新。

从孙权赐名的那田野稻，到红船上产生的理想之光，再到如今实验室里的微光，嘉兴的水，始终在唱着新的歌。当棹歌的韵律与科研的节拍在运河上交织，当千年的人文与现代的科技在这片土地共生，“吴根越角”的风华，便在新时代里，绽放出了更亮的光彩。